

DIZHICANKAOCONGSHU DIZHICANKAOCONGSHU

● 吉林出版社 ●

丛书

20

读查案手记



决策大京九

「中国脑库」与中南海

「97」中国刑事第一大案

旧中国十大商帮

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中国的足

金西性



以不变应万变	
——我看人民币为什么不贬值	1
股份制改造中“淮桔成枳”的教训	3
国企改革应注意非机制性因素	6
反思“抓大放小”	8
廿一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10
国际关系的重大变数	
——也谈东南亚金融危机	12
美国人如何看待廿一世纪	16
韩国人翻箱倒柜救国家	18
今年经济增速不会过高	20
朱镕基妙语连珠说蓝图	21
“中国脑库”与中南海	23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	25
李兆基：从银庄学徒到亚洲首富	29
“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	34
去台湾的民国名人魂归何处？	39
新华社香港分社新任社长姜恩柱	41
王云五晚年在台湾	44
中国住宅业的支点在哪里？	47
家庭小金库投向哪里？	
——调查七城市居民家庭理财方式	49
问君能有几多酬？	
——关于个人收入的零星调查	51
一份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	58
秘访滇西艾滋病村	60
我国目前基本国情	63

国有工业应果断收缩战线	63
企业拍卖普遍不规范	64
我国利用普惠制水平亟待提高	64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近期不变	57
公积金、保险金、养老金要不要纳税?	74
1979 年以来存贷款利率调整情况	65
“小病进药房”势在必行	7
我国将发布房地产价值指数	65
全国安居工程六成以上闲置	66
在建办公房十五年才能卖完	62
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 而是更多的法律	66
 中国妻子的幸福感	67
寻访健在的洋夫人	69
 中国电影凭什么得奖?	72
美术市场扩容，中青年画家备受关注	73
对电影节“黄牛”的一次访谈	75
巴托克与二十一世纪	76
中美电影市场对比	77
电视剧兴起“期货交易”	78
 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79
“把路翎的灵魂呼唤回来”	81
 新刑法为流失国有资产者定罪	84
'97 中国刑事第一大案	85
二十六岁银行干部十一个月挪用三亿二	89
 恐怖之源——生物武器	91
近 1000 年来改变人类生活的 50 件事	94
未来 30 年新技术预测	165

“上榜品牌”的幕后	98
稳健平实走远路	
——从美国惠普公司看高科技企业管理	101
雀巢公司全球筑“巢”	103
旧中国十大商帮	106
“新三届”的人生感悟	112
上海人与北京人有何差异?	114
道德新解	116
推敲推敲	
再“推敲推敲”	
“梁文茜现象”	118
15 岁的愿望与 45 岁的地位	119
坏得有水平	120
醒世箴言	121
追求有思想的学术	
——《学术集林》主编王元化访谈录	123
学会必要的区别	125
性的谎言	
——金西性学报告的真相	127
当前人文学者焦虑情绪应克服	130
“准学术书”畅销	130
决策大京九	131
1981 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138
今年的高考改革	149
帮助孩子“学会关心”	150
请了解自己的孩子	151
父母的人格榜样	152
中国的足球是方的	153
中国围棋“六小龙”	156
世界杯各队赔率	161

上海努力实施世界级航运中心发展计划

.....	162
重庆把发展金融业放在首位	162
南京外向型经济取得重大进展	163
四大铁路二期提速工程完毕	163
湖北“千湖之省”已名不副实	164
遵义实行领导待岗制	164
青藏高原还能造福于我们吗?	164

澳门建筑:风格迥异的凝固音乐	166
港岛“炒”风盛,殃及青少年	168

环球名街	169
圣托贝天体浴	70
探探 007 的大本营	172
瑞典让他们绝后	173
非洲的进步	176
德国人的观念	177
人类的两面:德国和日本	178

精神健康的尺度	181
恨与怒是致命的人格特质	181
给自己的身体排毒	182
春分话午睡	184
您的身高与太阳有关	184
有利健康的习惯	185
抗癌蔬菜排座次	185

厄尔尼诺现象成因有新说	186
春日话垂钓	186
雕塑的种类	111
光盘的保养方法	187
你知道这些商品符号吗?	71
专利号怎样识别?	187
击剑比赛怎样进行?	188

迎接海洋世纪	2
国际红十字会将易帜	105
萧乾老人的“七不”	122
名人签名轶闻	167

MULU
JUECE
DAJINGJIU
DUZHECAN
KAOCONGSHU

以不变应万变

——我看人民币为什么不贬值

□杨帆

1997年11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外汇市场就盛传人民币要贬值,江泽民、朱镕基、戴相龙均出面否认此说,指出人民币币值近年来一直是稳中趋升,目前没有必要贬值,中国将采取多种方法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但是,贬值预期仍然十分严重,居民和企业纷纷购买外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外汇黑市上一度贬到8.7:1。

主张以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的舆论,三年以来一直不断。1994年国内物价上升22%,有专家以“货币对内价值决定对外价值”,作为人民币贬值的根据;1995年修改出口退税率,上半年突击出口,下半年和第二年上半年因为统计关系,出口增长率下降,也成为主张人民币贬值的理由;出口退税不能及时办理,又有人主张以人民币贬值来弥补。目前,有人预测人民币要贬值,是以周边国家货币贬值12%—50%,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从而有可能损害中国国际竞争能力为根据的。我以为此论尚早,亦未必准确。

将出口成本与汇率挂钩,以货币贬值政策促进出口,是我国80年代的主要政策。但是,贬值会与国内通货膨胀彼此刺激,出现恶性循环。

90年代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实际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这是一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形式,它促进了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与国际资源相结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在出口猛增的同时,并未造成国内物价的增长。有人说,加工贸易没有起到出口创汇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摩擦,但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已经超过1700万,间接带动的就业有5000万。这说明,在中国,出口的作用已经不限于创造外汇,而是带动国内就业与总需求,促进产业结构改造和技术创新。当我国出口有60%是加工出口时,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进口原材料成本的降低。

1992年以后,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大量贸易通过外资企业进行,出口产品的加工越来越多地通过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农民工,从而发挥出低工资的优势,只要政府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并有效地帮助农民工培训和找寻工作,我看中国的低工资优势还会持续半个世纪。以家庭为主、长期智力投资的优势也将发挥出来。汇率政策在1993年大幅

度贬值一次以后,在三年内再没有以贬值方式促进出口,但是货币政策以紧缩形式降低国内物价,同样促进出口。紧缩政策产生的债务链条客观上促使企业降价出口,因为出口以后结汇,可以马上拿到人民币。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以出口退税和低息人民币贷款等方法支持出口。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产品在质量、价格等方面适应了国际市场的要求。只要你到美国的超级市场上看看,有40%的产品挂着外国名牌商标,背后却标有“MADE IN CHINA”,就可以知道,这不再是中国货廉价摆地摊,而是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总量上看,1997年中国出口增加20%以上,出现400亿美元最大贸易顺差,其中有一部分是经过贸易渠道结汇的投机资本,大约每年60亿美元,最多不超过100亿美元,就是说,真实的贸易顺差不少于300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增长27%,第二年增长必然下降,等到顺差消失,再贬人民币不迟。当然,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需求不振,出口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一半。如果出口下降,则需要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以保持经济增长,这对于中央政府是一个选择。

1997年,东南亚金融动荡,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只有人民币和港币坚挺,这对于我们是祸是福,

尚难预料。1998年中国内地的出口和香港楼市、股市可能受到影响,但是从战略高度考虑,国际资本正在对亚洲和拉美的前景进行评估,亚洲各国争当金融中心的态势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有利,自己的货币随人贬值,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出现更大的不稳定。并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极大的内需潜力,不像那些出口导向型小国,承受冲击的能力差。因此,在目前局势尚未明朗之前,还是用中国的传统方式:以不变应万变,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为好。

至于目前出现的贬值预期,并不会导致人民币真正的贬值,而只会减少升值的压力;另外,民间多储存一些外汇,可以减少中央货币当局的收购压力,藏富于民,还有利于促使人民币远期汇率形成。有贬值预期而没有贬值——这正是目前我们求之不得的一种局面。

(摘自《环球时报》)

迎接海洋世纪

1998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海洋年”。许多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成为海洋的世纪。

浩瀚的大海是巨大的“资源宝库”。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世界所有耕地的1000倍,每年提供的水产品至少可以养活300亿人;埋藏在海底的1350亿吨石油和140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勘探开发潜力巨大。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股份制改造中“淮桔成枳”的教训

□何清涟

国有企业的病根在于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当初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目的就是祛除这一病根,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淮桔成枳”的原因何在

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没有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行为的外部机制。前几年“股份制”这张王牌失灵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解决“企业无上级”的问题。在正统的股东主权模式中,经理层的无能、怠惰以及道德风险都是通过外部股东来校正的,外部股东要发挥作用,则要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功能的资本市场。除此以外,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劳动市场。但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与劳务市场都是缺少的。改制后的企业经理层基本上还是通过上级行政命令指派,一些地区搞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也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关心的也不是

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会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选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一,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所谓“监督作用”纯属子虚乌有。不少企业反映,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一人兼任,更兼监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本企业的职工,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并不能参与、了解决策过程,形同虚设。在许多股份制企业中,企业制度并没有什么创新。除了上市公司有份说明公司资产状况的“招股说明书”和一年一度的“财务报告”之类的材料之外,绝大多数“内部股份制”公司都没有“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之类的东西提供给股东。这种情况在内地尤其突出。不少股东其实既不

了解公司过去数年的经营业绩,又不了解公司事实上的主营收入。“企业效益”最多成为股东们在股市上的“炒作题材”,因为没有几个股东(包括兼具股东和职工双重身份的人)想长期持有股票,成为“主人”。

二、在企业经理层与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不能促使企业为提高资金回报率而作相应的努力,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不少企业搞所谓“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唯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公司简介中有了一张模仿国外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图。除了部分企业成功地利用集来的资金进行产品转向之外,不少企业都采取一种“瞒上不瞒下”的做法,对政府只要汇报自己如何通过努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机制,使政府主管部门有业绩向上申报就行,股金的运用则基本上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因此在资金的使用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将筹得的资金拿去放高利贷,有的拿去投放到泡沫经济领域,炒房地产、股票、期货。还有的企业在投资时,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书中对股东的承诺,随意支配资金,改变用途。由于投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的资金最后都被套在房地产、股票等项目上,经营困难,连股东的基本利益都没法保证。有的企

业虽未盈利,但是为了强化对股东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红”,每年倒贴14%—16%的股息给个人股东和法人股,某市一家股份制企业经营亏损,根本就没有钱分红,该市的政府领导竟帮着企业去借钱来分红。据笔者调查,某一家在市场上颇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连年亏损。当总公司领导班子做出决定,规定凡连续亏损3年以上的公司经理在审计工作结束后就地免职,其属下的二级公司除两家和别人合营的公司之外,全资子公司的经理全部提出辞职。私下里有经理对其好友说,留下来也没有太大的油水,自己已有实力出去干,没必要受免职之辱。有一些公司在“改造”成“内部股份公司”几年以后,因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股票迟迟不能上市,股东啧有烦言。公司因股票购买者多是得罪不起的“关系户”和本公司员工,便又将股票款悉数退给股东。

可以说,上述这些企业在用股份制重组企业资产后,国有企业那种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弊病在这些国有股占大头的股份制企业里一如其旧:经理层对股东的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股东大会不可能因经营层的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他们解职,因为任免经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决定权不在

股东们手中,而在最大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門手中。在这类股份公司里面,股东的身份由国家变为企业法人或者个人,只意味着资产风险从国家那里转移给其他的法人或个人股东。

经理层道德风险产生的温床

综上所述,可以说现阶段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层的任命机制,决定了这些股份企业的经营层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样,“经营领导”(即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面对现行任用、考察股份制企业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的方式与标准,这些经营者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眼睛朝下”,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他们认为这只是出于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因为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往往一个企业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候,明升暗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而选择“眼睛向上”,苦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即便把“股份公司”的财富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许多厂长经

理们仍然很“明智”地将很大精力放到了“经营领导”,即经营人际关系上。保位子、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压问题、盼提拔等等,就是厂长经理们花大力气经营人际关系的真正原因。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还会被“经营”,不仅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所有换上股份制招牌的“翻牌公司”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可以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企业无上级”,即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机制问题,就不可能让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的财产有效地负起道德责任。笔者曾问过好几个经改制而成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在国有企业做“老总”与在股份制企业做“老总”有何区别,他们都笑说:“公司名字改了,每年要开个股东大会,发布财务报表。其他没有什么,什么都还归政府部门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使用“股份制”成功地重组了国有资产,也无法在改变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而如果不改变经营机制,改制后的企业仍然无法走出困境。

上述原因是我国企业问题丛生的渊藪。可以说,只要对经营者行

国企改革应注意非机制性因素

据美国洛杉矶《国际日报》报道：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全面、彻底的攻坚阶段，但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改制后的新公司，在产权明晰、责任到人、“联股联心”后，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出现奇迹。究其原因，并非改制本身错了，恰恰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即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非机制性因素的问题，国企改革中的非机制性因素有哪些呢？主要有：

一、负债过高的问题。1985年，中国国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18%，现在已高达80%以上，有40%以上县属国有企业已资不抵债。许多地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往往采取将所剩无几的净资产公开分、卖给职工，将巨额债务由企业转到职工或购买者身上，这实际上没有认真解决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

按照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企业要维护正常经营和竞争，资产负债率一般不能超过60%。在中国目前企业资产质量较差、效益低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应该更低。

二、资本质量差的问题。资本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不良资产比例大。据调查，目前中国国企账面资产中，不良资产一般占到1/3左右。这部分资产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中的闲置厂房、设备、设施；在拟改贷建设项目中高息贷款下的利益、资金不到位，拖欠工期中增大的投资成本，建设项目管理混乱下造成浪费的虚张资产。此外，还有在低折旧率下账上有实际无多大使用价值的残存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则主要是名存实

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不仅股份制面临前述那种“新瓶装旧酒”的局面，其他改制方法如“债权改股权”之类也莫不如此。

总之，股份制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企业资产组织方式，而且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产物。它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才能有效运作。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

规极不容易，但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遇到相同的困扰：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走形变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懂得了这一点，介入决策的学者们就应该在制度设计时，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力措施，以免“准桔成枳”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如弄得不好，有可能引起危机共振。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亡的应收款(呆坏账)。其次是资本结构不合理。许多国企是在“大而全”、“小而全”指导思想下建立的,与专业分工、规模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去甚远,资本利用率非常低,结构效益差。

三、结构问题。从宏观看,主要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应合理,要有为企业导向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培育应立足于本地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资金、技术和企业优势;而产业结构上必须是优势互补而不是互相掣肘。

从微观看,关键要培植企业主导产品。在企业的生存发展维系于市场,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得不“围绕订单转”的情况下,企业有无主导产品及主导产品的技术先进程度、质

量、价格、市场占有率,是决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一般而言,主导产品销售收入占到企业总销售的60%以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比较主动。

四、管理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原有的管理队伍大多是在计划经济或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都与现实有一定距离。

如何尽快培养建立一支适应市场竞争的职业企业家队伍,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一批新机制企业因缺乏精明强干的经营者而削弱竞争力,最后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因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不是物。(摘自《环球时报》)

我国继颁布

“小病进药房”势在必行
我国将实施非处方药制度

担,也有利于患者合理用药,保证了消费者用药的安全和有效,顺应了个人保健发展的趋

非处方药的特点是:不需处方和医师药师监督;说明书和标签可指导用药;治疗小疾患安全有效确切;减轻和治疗慢性疾病;无毒副作用和药物的依赖性;儿童和成人用药包装规范;贮存质量稳定和有助于治疗以及促进健康。

此制度有利于药品管理,有利于减轻国家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负

势。在我国实施非处方药制度势在必行。

据悉,我国卫生部门已联合成立了国家非处方药领导小组,正式委托中国药学会仔细研究了国外非处方药制度,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了开展此制度对我国各方面的影响,并着手开始遴选工作。

(摘自《服务导报》)

反思“抓大放小”

□李玉琪

中国目前的企业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国有企业，一为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效益低下，相当多的企业既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也不能保持住原有的价值，企业实际已处于停工与倒闭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极力回避产权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旧有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分离析，而新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又非常模糊不确定。国营企业事实上处于一种只有人用各种手段和机会去分割、蚕食、捞钱，而没有人去管理、运作、经营、挣钱的状态。

中国的民营企业被国外一些人土称之为“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足以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不少人对其抱有极大的希望。由于产权制度的缘故，这部分企业的确有很强的内在发展动力，但如果对其寄以过高的期望则有些不妥。

民营企业目前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技术含量低、管理方式落后、没有规模效益等等。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寄生性，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在技术、人才、市场、原材料等诸方面是依附于国有企业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低成本高效益与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是一体的联动关系。一旦国有企业崩溃，民营企业根本不能在同时或较短的时间内撑起中国经济。

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只是国有企业本身的事，也是民营企业的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事。过去的改革想尽办法，试图在不触动主体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解决这些问题，均告无效。于是才有了股份制与“抓大放小”等思路的提出。

目前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抓大放小”，似乎可以理解政府继续保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体产权，对现存的小型国有企业则彻底民营化，通过股份化、兼并、破产等手段，改变其产权关系，使之成为市场经济中有自我生存能力的独立经济实体。

这一思路的实际根据主要有三条：

1. 意识形态上的根据：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只要保证这部分的所有制仍是以国有为主体，就可以说是公有制占主体了，至于小型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则可以多样化。

2. 政权基础上的根据:政府只有掌握住经济命脉,才能牢牢地控制政权,才能有管理宏观经济的力量,所以,政府仍要保持对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大中型企业的控制。

3. 利益分配上的根据:目前小型国有企业因为规模小、设备老化等技术性原因,如果继续在旧体制下运行,已经没有利益可以分割,没有油水可捞,所以,干脆作为负担甩掉。大中型企业的设备相对比较先进,还有油水可捞,各级部门均有从中取利的机会,所以,仍应抓在政府手里。

以理性的原则来分析,上述三条根据均不能成立。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事实上早已失去其过去曾有的约束力。十多年来,改革不仅逐步消解了旧的体制,也消解了与旧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被社会主体接受为一种生存意义的合理解释时,才能对社会普通成员具有约束力。而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还能在主流意识形态找到生存的意义呢?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无法为新体制提供精神资源了。如果将这种丧失生存功能的意识形态作为决策根据,既无助于推进新体制的建立,也无助于使旧的意识形态恢复生命力,更不会被社会主体所接受。

第二,关于政权基础。的确,任何政权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办企业,政府亲自去挣钱,事实上,人类政治活动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政权的经济基础主要来源于税收,而不是自办产业。中国古代政治家多次提到不要“与民争利”,其出发点不是削弱政府的基础,而是加强政府的基础。任何政权的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公共权力机关来保证社会总体的有效运转,政府只有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出现时,才有收取赋税、建立公共财政的理由。如果政府也大办企业,必然伤害其公共权力的公正性,也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生活的非经济干扰,影响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从而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

第三,关于利益分配。如果政府仅从其本身或某些部门利益出发去制定有关全社会的公共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政府是不负责的,这项政策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自动放弃了其合法性基础,将自身置于社会利益的对立面。

一个其存在根据不能成立的思路应该放弃。

“抓大放小”这一思路的根本缺陷在于,不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去为新体制下的政府与企业定位,而是从政府的主观愿望出发,选择与政府短期目标最为接近的手段,如此,必定造成此项政策与其所标榜的目标之间的悖谬。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廿一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美〕安迪·海因斯

一个国际经济学家组织在《21 世纪的中国》这份报告中推断,下个世纪初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产值超过美、德等 20 世纪的经济超级巨星,但这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处理好几个内部机构问题和社会制定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

1、基础设施的完善

中国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运输的障碍已经耗去国内生产总值的 1%,然而,用于交通设施方面的投资在 90 年代实际上减少了。能源生产的需求在急剧上升,中国的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使能源变得日趋紧张。由于公路交通的普遍快速发展,在能源需求上增长最快的可能是石油。另外,中国国内资本市场、银行部门以及金融服务还比较落后。

2、投资资本的获得

尽管中国人以善于积蓄而著称,但仍然需要外资(包括技术知识)的投入。目前,出口的大幅增长提供了资本,但全球经济是否有能力持续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仍是一个未知数。

3、保持改革进程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大多数

部门已经有效地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状况,这些企业普遍管理不善。

4、遵守行业法规

在国际商业界,中国被看作是一个高风险投资地区。中国必须进行司法改革,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与此同时,对腐败问题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或许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它可视中国遵守国际规章与惯例的情况向中国提供其继续发展所需的资本和专业知识。

5、环境保护

中国排出的温室气体放射物占世界温室体放射物的 11%。在煤和石油燃烧过程中不采取防污染措施或提高效率的改进措施,再加上日益繁重的公路交通所带来的污染,可能给环境造成极坏的影响。

6、自给自足

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 22%,但可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 7%,耕地面积减少和水源的短缺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持悲观态度的人中包括世界观察机构的莱斯特·布朗。他预测,到 2030 年中国需进口的粮食将超过 2 亿吨。但中国经济学家持乐观态度,他们期望技术革新能使中国保持高水平的自给自足。

7、使整个社会团结一致

截至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存在的问题,可一旦增长减慢,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问题并加剧繁荣的沿海地区与以农业为主的内

地贫困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内经济能否为日益增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高薪工作。

8、中国经济与国际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应,主要是依据世界是否能够或愿意吸收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大量出口商品。从积极的方面看,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开放了进口市场,应该能够抵消出口所带来的危胁。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均衡的机会。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德怀特·帕金斯就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3种可能的情形:

1) 高速增长方式

要想保持每年8%或9%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不出一点差错。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应加强,改革要继续深入,国有企业应大胆改革,腐败应得到遏止。要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利用。应继续保持较高的国民存款率。应直接引进外资改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应提高教育质量,以更大的努力去吸引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回国。中国由于部分放宽了进口政策,世界经济愿意接受来自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商品。

2) 外部环境恶化

最可能引发的问题是中国快速

增长的商品出口是否会导致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经济不愿愿接受中国商品出口的冲击,特别是当它认为中国自己的市场还相对封闭时。另一个可能引发的问题是香港失控。其结果是中国国内经济不能消化其生产能力,因而增长速度放慢。由于经济方面的困境,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倒退。

3) 官僚主义盛行

那些一贯对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猛拉改革的后腿,使权力牢牢控制在政府官僚机构手中。腐败日益猖獗。中国繁荣的沿海地区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由于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社会出现动荡,政府强行采取更强硬的压制手段。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降至4% - 5%。

9、中国的前景

撰写《21世纪的中国》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处理好国内矛盾,而且外部环境也有利,中国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如果其中有一点做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将放慢,但也只不过会推迟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

(摘自《编译参考》,

原载美《未来主义者》)

(上接第20页)

因素,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今后几年国民经济不会也不应该出现增长速度过高的问题。

(摘自《新闻报》)

国际关系的重大变数

——也谈东亚金融危机

□ 庞中英

去年夏季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次危机自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结束以来就在酝酿,情况日趋严重,只是当时没有引起有关国家的注意。东亚金融危机震动了美欧经济和整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应该说,这场危机程度之严重、波及范围之广泛远超过人们的预料。东亚金融危机是90年代以来继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北约东扩后的又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现在估计它的影响程度为时尚早,但金融危机已使长期高速增长、作为世界经济三大中心之一的东亚国家普遍进入一个被迫性的全面调整和改革时期,这必然对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

金钱面前“低头”

陷于这场危机的东亚国家,为了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严格贷款条件,按照它的要求进行调整、改革和开放,决定性地打开了向来相对封闭的东亚市场。然而,由于在IMF指导下的经济调整难度和风险

很大,在实施整个金融救助计划过程中,这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可能产生紧张关系甚至冲突。东亚国家不可能完全走IMF为之设计的道路。

IMF已经决定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加上已经给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贷款,该组织为实施救助东亚金融体系已经动员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IMF历史上空前的“救火”行动。为获得IMF的帮助,有关各国不得不完全答应实行IMF为之设计的经济改革计划,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和整顿金融市场,出台了一系列紧缩经济政策。但是,某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的国内政治结构,导致政经不正常地结合,经济结构扭曲。当前,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均面临大选或者领导人接班的迫切问题,政局相对不稳定。金融危机已经加剧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矛盾,泰国已发生政府更迭。这些国家长期形成了政府官员与银行、企业之间的密切关联,IMF开出的“苦药方”必然牵动各方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导致外国金融机构和西方跨国公司的控制强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主权丧失,使国内的